

M2增速放缓 4月金融数据回落

新增中长期贷款占比提高

根据央行披露的数据,4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47万亿元,其中超五成贷款来自于企业贷款增长。而与上年同期相比,4月人民币贷款同比少增2293亿元,与2019年同期相比则多增4525亿元。

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5283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365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4918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7552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2147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6605亿元,票据融资增加2711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增加1532亿元。

北京商报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对比2020年同期数据,2021年4月人民币贷款增速与增量均有所放缓,住户部门贷款以及企业贷款增量也存在较大差异。而环比2021年3月数据,3月人民币贷款增加2.73万亿元。

从新增贷款结构上看,住户贷款和企业贷款两大板块中,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的额度差异环比有所增大,中长期贷款占新增贷款总额的比重有所提高。2020年4月,新增中长期贷款占总增长比重为58.44%,2021年占比为78.39%。

在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看来,2021年4月人民币贷款数据与上年同期相比放缓,主要是受2020年“高基数”影响,由于疫情这一特殊情况,国内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周茂华指出,从住户信贷稳步增长、企业中长期贷款表现强劲、近两年新增信贷均值明显高于2019年等方面来看,国内信贷环境仍保持适度宽松格局。这也反映了国内实体经济信贷需求强劲,预示国内经济有望延续复苏势头。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直言,不必过多关注与去年同比数据,与2019年等正常年份相比,4月信贷规模增长能够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中长期贷款新增占比提高,新增人民币信贷结构优化,表明了货币政策加大

2021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出炉。5月12日,央行官网披露2021年4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4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47万亿元,同比少增2293亿元。4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85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少1.25万亿元。广义货币(M2)与狭义货币(M1)增速进一步放缓。业内人士分析认为,4月金融数据增速不及预期,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不减,预计后续央行将灵活利用多种政策工具,应对短期因素的扰动。



对实体经济的结构性支持力度。

新增社融、M2增速回落

社融规模方面,2021年4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8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1.25万亿元,比2019年同期多1797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28万亿元,同比少增3399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减少272亿元,同比多减1182亿元。

在货币供应方面,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26.21万亿元,同比增长8.1%,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1.3个和3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60.54万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比上月末低0.9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0.7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8.58万亿元,同比增长5.3%。当月

净回笼现金740亿元。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从此前市场预估的数据来看,新增社融以及M2增速均低于市场预期。对于这一情况,温彬指出,M2增速同比回落,一方面在于2020年疫情期间,央行加大了市场流动性的投放;另一方面则在于财政存款增长较快,政府债券集中发行节奏加快,且4月为缴税大月,货币回笼力度加大。

周茂华分析表示,去年特殊时期国内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今年货币政策以稳为主,最终使得4月M2下滑。但从近两年月底均值看,2021年1-4月M2增速均值同比均高于2019年,显示国内货币环境仍保持适度宽松。但数据也提醒市场,特殊时期的“宽松环境”已经过去。

另一方面,数据显示,4月,银行间人民币市场以拆借、现券和回购方式合计成交

112.61万亿元。4月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2.01%,与上月持平,比上年同期高0.9个百分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1.96%,比上月低0.05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0.85个百分点。

温彬认为,当前市场流动性仍旧是合理充裕的,市场利率保持平稳,M2的流动性与经济基本面相适应,也满足了实体经济的需要。而社融回落也与当前维护宏观杠杆率稳定的要求一致。

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4月金融数据不及预期,也引发了市场热议。温彬进一步分析道,整体来看,本月金融数据增速不及预期,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不减。

温彬强调,要客观看待部分数据回落,一

正式启动IPO 湖北银行上市还有多远

北京商报讯(记者 孟凡霞 马婧)成立第10年,湖北银行正式启动了A股上市辅导程序。5月10日,湖北证监局官网发布的《湖北辖区拟首次公开发行公司辅导工作基本情况表》显示,湖北银行位列其中,辅导机构为中信证券。

2010年初,湖北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原宜昌、襄阳、荆州、黄石、孝感五家城市商业银行的基础上,采取新设合并的方式组建湖北银行。2011年2月27日,湖北银行正式成立,总部设在武汉。

对于奔赴资本市场,湖北银行已规划多年,2015年,该行正式启动上市前期各项工作,并于当年年报中披露了上市意图,宣告与股东初步达成“先启动H股,再择机回归A股”的共识。而后,2018年年报中该行五年发展目标再次提及要“五年上市”。

对于如今湖北银行A股IPO率先传出实质性进展的消息,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表示,湖北银行上市规划多年,属于湖北省内对城商行资源整合的重要布局,势在必行,前期考虑到湖北银行的实际情况,A股上市难度较大,所以计划先通过对上市要求较低,且已经有不少同类城商行已挂牌的H股上市,来完成初步融资目标,这也是很多情况类似的银行的选择。只是随着A股注册制的推进,后续直接A股上市的可能性也在提升。

值得关注的是,当下A股排队IPO的竞争对手林立,湖北银行想要顺利上市还需迎战诸多考验。业绩方面,截至2020年末,湖北银行的资产总额为3044.68亿元,同比增长16.09%。但过去一年,湖北银行营收、净利润双双下滑,营业收入为78.21亿元,同比减少2.27%;净利润为15.53亿元,同比减少20.78%。对于业绩下滑,湖北银行在年报中解释为:受疫情后减费让利的影响,贷款营业收入出现一定程度下滑。

从收入构成来看,利息净收入为湖北银行贡献了营收的主要来源,2020年该行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为94.13%,投资收益占比3.22%,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2.4%。资产质量方面,截至2020年末,湖北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

是基数效应对M2的扰动较大,如果剔除基数影响,2019年至今的两年平均同比增长率为9.6%,基本处于合理水平。二是信贷增量回落但结构有所改善,企业中长期贷款比去年同期多增,居民和企业短期贷款投放相对谨慎;三是金融数据走势整体与当前经济恢复情况相适应,在当前稳增长压力较小的窗口期,货币政策更偏向于防风险和结构性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

周茂华同样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信贷社融仍将维持适度宽松格局,一方面是国内经济延续复苏态势,实体信贷融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是国内政策不急转弯,继续为经济提供必要支持。

对于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走势,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就在央行5月11日发布的2021年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再次强调,将继续按照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的要求,坚持“稳字当头”,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做好跨周期流动性安排,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引导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波动,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周茂华表示,预计后续市场流动性有望继续保持合理充裕,主要是国内经济仍处于恢复阶段,需要一定力度政策支持;预计后续央行将灵活利用多种政策工具,应对短期因素对资金面的扰动。

温彬则进一步强调称,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将继续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预计央行将延续等量或小幅缩量续作MLF和每日小幅对冲到期逆回购的方式,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波动。继续强化结构性调节,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等的支持力度。在基数效应影响下,未来金融数据仍可能出现波动,但M2和社融增速的整体走势将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廖蒙

聚焦Focus

吉林信托难逃“董事长落马魔咒”

北京商报讯(记者 孟凡霞 宋亦桐)一天之内,两任原“一把手”获刑、被公诉的消息再次将吉林信托推向了风口。从判决信息来看,因贪污受贿行贿等罪,吉林信托原董事长高福波获刑20年;同日,吉林信托原董事长邵戈也因涉嫌贪污罪、受贿罪等被公诉。在分析人士看来,管理层持续动荡,业务开展停滞,也导致吉林信托经营指标持续恶化,如没有外部力量干预,这一态势还会延续下去较长时间,影响到吉林信托可持续经营能力。

吉林信托2021年的日子不好过,5月11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公布了吉林信托第二任董事长高福波、第四任董事长邵戈的判刑以及调查结果。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高福波犯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510万元,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

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信息显示,邵戈因涉嫌贪污罪、受贿罪、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一案,经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白城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作为吉林省唯一一家专业从事金融信托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吉林信托在2001年3月改制为责任公司之后,一共经历了4位董事长,但4位董事长均被查处。北京商报记者根据公开信息梳理发现,2007年6月,吉林信托第

一任董事长张兴波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后因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死缓。

张兴波落马后,2007年6月第二任董事长高福波紧急继任,后于2015年10月辞职。辞职三年后,2018年12月高福波因涉嫌严重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被查处。

第三任董事长李伟为高福波继任者,2015年9月接任吉林信托董事长,2017年8月被查处,2020年3月,李伟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在第三任董事长判刑仅6个月左右,上任不过两年的第四任董事长邵戈也同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

四任“一把手”先后被查处反映出吉林信托内部治理的缺失,4月30日,吉林信托发布了2020年度业绩经营数据,报告期内,吉林信托实现营业收入2.98亿元,同比2019年的5.88亿元下降49.32%;归母净利润为1492.8万元,同比2019年的1.91亿元下滑92.18%。

从各项收入来看,2020年,吉林信托实现利息净收入-9370.65万元,较2019年的2.07亿元下降超145%。除了盈利能力下滑,尤其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吉林信托有一项净资产指标已经跌破监管“红线”,从年报数据来看,2020年末,吉林信托净资产余额为98984.48万元;各项业务风险资本之和为95355.3万元,净资产/各项业务风险资本之和为103.81%;净资产/净资产为24.82%。

而根据《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信托公司应当持续符合净资产不得低于各项风险资本之和的100%、净资产不得低于净资产的40%风险控制指标。吉林信托净资产/净资产指标为24.82%,这一比例已经跌破监管划定的标准。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吉林信托管理层持续动荡,业务开展停滞,历史问题留存较多且很多尚无具体解决时间表,导致公司经营指标持续恶化。其中净资产指标无法达标,会持续延长该公司新增业务的暂停时间,从而导致亏损进一步加大。如没有外部力量干预,这一态势还会延续较长时间,影响到吉林信托可持续经营能力。

吉林信托在公司治理机制方面的短板显而易见,根据年报,银保监会吉林监管局于2020年6月23日至7月31日对吉林信托开展了综合性现场检查,并于检查后下发了《现场检查意见书》。吉林信托方面则根据《现场检查意见书》制定了整改方案,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强化股东股权管理工作,完善内控措施,完善相关管理制度、相关审批内容及流程,提升业务合规性;持续加强尽职管理,提高自主管理信托财产能力;加大监管意见落实力度,加强责任追究等。

针对业绩经营下滑、净资产指标跌破监管“红线”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尝试多次致电吉林信托年报披露的联系电话进行采访,但电话始终未有人接听。